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习近平主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建军90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现在，我军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开启了强军兴军新征程。回顾90年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和备战打仗，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深刻启示意义。

□ 刘茂杰

我军90年的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创造。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艰辛探索，创造性建立了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一整套思想理论、根本原则和制度体系，确保了我军始终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为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政治要求，作为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宝，进一步上升到强军之魂的高度加以强调，丰富和升华了我军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着特殊的中国国情、紧迫的实践要求和深刻的中国必然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掌握绝对可靠的革命武装。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军队并没有清醒的、透彻的认识。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我们曾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建设军队，放弃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然而，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明确提

出，“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深刻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我们党展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随着我军建设发展逐步形成并巩固完善。建军之初，我们党就在各军、师、团设立了党代表。“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延伸到了最基层、最前沿，直达每一个士兵。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普遍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支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党的组织系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继续坚持对军队独立、单一领导的原则，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地各级党委为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力量的集中统一。解放战争时期，制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不断健全。新中国成立后，将建军根本原则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相继颁布修订《政治工作条例》、《党委工作条例》、《党支部工作条例》等法规性文件，集中规范和不断完善了党对军队实施政治、思想、组织领导问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形成巩固，彻底消除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我军在应对各种复杂形势、危险局面和艰巨任务中更加强大。回顾我军90年的战斗发展历程，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严峻考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军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对内克服了分裂主义、山头主义影响和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对外挫败了敌人的干涉渗透，争共产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确保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长征途

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妄图以枪制党，其分裂活动失败后叛逃到国民党，连自己的警卫员也拒绝跟他走。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的特殊背景下，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红军吞并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党内也出现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我们党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及时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始终牢牢掌握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建军治军提供宝贵精神财富

坚持以先进思想指引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先在于思想上的领导。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说过，只有组织领导，没有思想领导也是错误的，也是等于没有党的领导。90年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军事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全军“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坚持不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官兵思想，指导部队建设。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整党整风，从新世纪新阶段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我们党毫不放松地抓好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以科学制度保证落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章明确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一大上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至党的十八大先后制定、修改过17次党章，但无论怎样修改，都保留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规定和要求。这一规定和要求不是抽象的，而是有一整套制度作保证的。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党委、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掌握部队的重要组织支撑，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原则落地生根的坚实基础。这一整套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越是在重大考验面前越能显现作用。在我军历史上，作战中有整团整师牺牲的，但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发挥了坚如磐石的根本保证作用。

坚持以优秀人才提供支撑。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人选好人用好人，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保证和关键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主要通过战争实践培养选拔人才，许多官兵在残酷战斗中经受血火考验，从普通老百姓、放牛娃锻炼成长为忠于党和人民的杰出军事将领。为加强对人才的正规化教育训练，毛泽东亲自创办红四军教导队和红军大学，并为抗日军政大学确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还经常给学员讲课。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在各根据地的14所分校共培养了10多万名军政人才。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我们党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提出，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干部的选择上，必须勇敢地引进阶级意识坚定的、政治上坚定的分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明确提出选拔干部要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更为重要。从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选用干部标准，到习近平主席提出“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考察干部的原则，不断提高从政治上考察使用干部的准确

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确保了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坚持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纪律严明、执纪如铁，是我军的红色传统和文化基因。建军90年来，我军一代又一代官兵自觉把纪律视为生命，特别是把听党指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纪律来遵守，以铁一般纪律确保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地生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创设中国工农红军“行动听指挥”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第一条讲的就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化观点等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反对措施。1942年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强化党风党纪克服宗派和山头现象，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更加集中统一。1948年，针对党内军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等现象，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靠严明纪律保证落实，要把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情况作为检验部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标准，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切实维护党指挥枪各项原则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深刻把握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变化，不断增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遇到的挑战和考验明显增多，既要防范外部的冲击影响，也要警惕内部的消极因素。

狠抓政治引领。政治引领是最根

本的引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认真组织党史军史教育，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积极稳妥开展网上斗争，不断夯实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

增强贯彻执行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革命战争年代，党指向哪就坚决打到哪，是听党指挥的直接体现。长征途中，张国焘多次逼朱德总司令表态反对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坚定地回答：“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建设时期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当前，有的官兵落实命令指示打折扣、搞变通、打擦边球，都是贯彻执行力不强、坚持党的领导不够好的表现。必须进一步强化号令意识、服从意识，特别是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经全面展开，涉及单位调整转隶、部队换防移驻、人员进退去留，这是对每名官兵政治上最现实、最直接的考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的事情，必须坚决执行，遇到再大矛盾和问题也要坚决执行，确保军令政令畅通，确保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决策指示一贯到底。

创新实现形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是指一切有利于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实现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我军历史上正是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才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得以固化完善。当前正在进行的军队改革，把政治建设的原则要求和制度设计，融入组织形态和力量体系重塑全过程，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把军委机关由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坚持优化领导指挥体制与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军事制度相统一，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了更加坚实的组织依托和体制保障。要扎实抓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改革任务落实，突出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进一步严起来实起来，完善军委工作规则和军委工作“三项机制”，确保我军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和政治保证。



打造中国特色的强军文化



□ 王红续 梁琳

90年前南昌起义的枪声，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结合中国实际，领导这支人民军队攻坚克难，从小到大，走向辉煌，坚持并不断创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强军文化。

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通俗表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的立军之魂。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始实行政治建军的新制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军队英勇奋战而不溃散。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

题》中针对张国焘向党争兵权的历史教训，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都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强调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立军之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支军队的根本属性，从而划清了它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界限，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这支新型军队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项基本任务。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目标确定。打仗消灭敌人，是这支军队的首要任务。在革命战争时期，一切服从于革命战争，解放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人民的和平建设。军队还担负宣传、组织、武装和援助群众的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军队帮助人民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除了担负巩固和保卫人民政权、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外，还担负一定的生产任务，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

军队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一战略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的必由之路，是应对复杂国际安全局势的重大举措。

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如何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要解决的战略主题和特殊难题。

智胜为用，道胜为本，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根本法则。这一法则揭示的真理是，以弱胜强最终要依靠正义的感召力，要靠赢得天下人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最大政治优势就是搞了土地革命，从而赢得了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这支军队的战略战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这种战略战术。因此，战略智胜以强大的道义为依托。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战略道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坚持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国防和军队改革与建设开创了崭新局面。

党委领导军事实践

□ 洪超印

我军各级党委是各该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一切组织、人员和工作必须置于党委领导之下，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讨论决

定。这是我们党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过程中，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创造，体现了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根本优势。

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是通过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来保证实现的。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党委制、双首长制、政治委员制，是我党我军通过长期艰辛探索，逐步发展形成的。南昌起义部队就设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古田会议确立了党组织在部队的领导中枢地位。1931年底受党内“左”倾错误影响，盲目照搬苏军经验，以“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取代党委制，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党的集体领导逐步得到恢复。抗日战争初期，为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我军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受到干扰，部队作风松懈、战斗力下降，因此不到两个月就恢复了。党的七大正式提出恢复党委制。1953年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确定下来，从此未有任何动摇和移易。

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根本在把方向、抓大事、管全局，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都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

准确领会中央意图，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保证了中央战略决心的实现；关键在实现领导指挥的最佳效能，大的方针原则确定后，各级指挥员根据现实情况变化，审时度势地创造性开展工作，毛泽东在指挥战役战斗下发的文电中，经常出现“望酌情处理之”“情况紧急，可机断行事”等用语；重点在凝聚形成强大合力，党委统筹运用军事、政治、保障、信息等各种资源，有利于围绕目标形成“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在平津、淮海战役中，我军都创造性地组建总前委，统筹前线一切事宜。实践证明，党委的正确领导，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和军队集中统一，确保军事行动捷高效，极大凝聚和激发官兵的意志力量，是科学的治军之道。

习近平主席强调，党委制、双首长制、政治委员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政治设计，并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的地位作用比喻为“定海神针”。新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复杂严峻，必须认真总结党委领导我军军事实践的历史经验，大力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坚定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积极创新完善党委对部队实施领导的实现形式，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